

## 由文學到美學

--白先勇先生訪談錄

廖玉蕙 2002.11.16.

車子在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上，一路驅馳了約莫兩個小時，終於從洛杉磯到達聖塔芭芭拉。因為先前作了功課，向小說家請教之不足，還上網查詢了路線。所以，雖然在幾個可疑的路口稍有踟躕，終究都作了正確的抉擇。

聽說小說家晏起成習，我們先在附近的廣東館子吃飯兼等待預約的時間。館子裡的侍者說，白先勇先生是他們店裡的常客，他們久聞文名。吃過飯，我們繞道小鎮的超商，買了一打黃色的玫瑰。到了小說家的門首，不覺莞爾！迎接我們的是一片豔麗花海，相形之下，手上的玫瑰顯得寒碇可笑。幸而，小說家深受儒家溫柔敦厚詩旨的影響，依舊以嘖嘖的讚美接過並立刻為那束可憐的玫瑰找了漂亮的安居之所。

高聳的樹木，各色的花朵，白家的住宅簡直被粉紅駭綠團團圍住。後院的茶花，品類萬端，雖然尚未含苞，白先生卻如數家珍地為我們一一介紹花朵的顏色、長相，他說：每一株都是他親手植栽；我心裡記掛的卻是：四月群花競放時，會是何等繁華且嚇人的景象！

我們原是打算來和小說家談談寫作的，沒料到白先生憂國憂時，一談到他所關心的教改，竟一發不可收拾。回來重看錄影帶時，發現他時而拍案立起、時而蹙眉瞪眼、時而朗聲大笑！肢體語言豐富，不時還激動地跳出攝影鏡頭之外。屋裡的擺設，件件有來歷；屋外的花樹，株株是心血。《台北人》裡的繁華盛景，竟似轉移了陣地，在異地重生。雖然，白先生的笑語喧闐，鬧得寂靜無聲的社區彷彿紛紛醒轉了過來似的。然而，總不免想起小說家在悼念亡友的〈樹猶如此〉裡說的：

「春日負暄，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仰首偷覷了園中西隅，果然有那麼一塊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的楞楞空白。小心翼翼地，我們一句也不敢問起那「無法彌補的天裂」！

廖：我剛到這小鎮上來，感覺到它好像有一點點荒涼，是不是我的錯覺？還是它確實比較偏僻？

白：它不是的。它倒是個名城，三、四0年代好萊塢的重鎮是在這邊，許多大明星和 opera singer 都住在附近。城本身比較小，但是這裡有滿有名的音樂學院，Music Academic of the West（西方音樂學院）。所以這個城倒是有歷史和文化的。附近還是美國地價最高的地方之一！表面一看，是個非常安靜的小城。我喜歡這裡就是因為安靜，不過，朋友從台北那個滾滾紅塵來了以後，都會問：「這裡怎麼能住啊？」

廖：對啊！我就想，住在這兒好寂寞喔！

白：我倒喜歡有這麼一個安靜的環境。台北太好玩了，很浮躁的一個城。

廖：確實！那個城比較適合寫短篇，若真要架構一個長篇，可能真的需要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

白：這裡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天氣可能是最好的。像現在八月天，從來我都不用冷氣的，連扇子都不用。晚上睡覺還得蓋被，所以就沒有什麼所謂的大汗一身。四季如春，和台灣差不多。冬天還沒有台灣那麼冷，不溼。

廖：可是，美國這麼大，怎麼您就跑到這裡來了？

白：說起來這是緣。那年，他們這裡有個教職，是要教中國文學的。我的好朋友歐陽子的先生，本來申請到了，結果 field 不太合，就到 Texas U.去了。而我剛在 Iowa 念完書，開始找事情。他告訴我這兒有一個位置，我就來申請，沒想到就申請上了。1965 年，我來 interview，也是這個天氣。八月的黃昏，飛機降下來，下面一片金、一片紫，很美啊！那個山是紫色的，很漂亮的！我本來沒聽過這個城市，後來才知道它不只是個名城，還是選出來世界上五個最適合居住的城之一，我真是小看了它！但是，我弟弟來了還說，這個鳥都不生蛋的地方……。的確，它非常安靜的一個城。基本上它是一個大學城，有 UC Santa Barbara、音樂學院，還有一個 Books Institute,世界有名的教攝影的學校。它適合老年退休的人或讀書人居住，所以中壯年的人較少，有很多旅遊客。像 Chaplin（卓別林），就在城裡開了一間旅館，現在他的女兒在管。

滿有意思的一個城市，但是要耐得住寂寞。

廖：中國人多不多？您自己料理三餐嗎？

白：中國人越來越多。跟洛杉磯比，當然不算多。這裡有個好處，就是深居簡出，我的運氣很好，教了個碩士學生，畢業兩年了，自己開飯館，夫妻兩人對我非常好，等於一直在照顧老師。這個學生在城裡有餐館，每個禮拜都送個兩三次菜來，基本上我就賴以維生。一個人做飯很麻煩，不過有時候我高興起來，自己也做幾個菜。我有我的單身食譜，雖然簡單，不過我也不虐待自己，該吃的，還是要吃。我喜歡吃好東西，但是不挑嘴，什麼都可以吃，只要不是太難吃，容易打發。尤其前年我心臟開過刀，吃東西就更簡單一點了。

廖：現在從學校退休了，就寫《白崇禧傳》嗎？

白：除了《白崇禧傳》外，也寫一些短篇的。

廖：有沒有打算要再寫長篇的？

白：打算很多，但要寫出來才算數。

廖：以前您都是以寫小說為主，現在好像以寫散文居多？

白：我剛不是講「打算」很多嗎！但是寫小說比較是嚴肅的事，要求比較嚴，超越自己、挑戰自己是件最麻煩的事情。要寫出不同的東西，腦子裡有很多，最近我也想把紐約客的系列再延續下去，寫了幾篇了。

廖：我們也很喜歡你寫的散文。

白：真的嗎？那是偶而為之。散文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講一些心裡話，寫小說跟寫散文是兩個不同的文類。我覺得散文如果不說自己的話，就不好看，就變成論文或報導了。

廖：其實，大家看散文多半有一種偷窺的慾望。

白：對，就像妳寫失眠那篇，我就很喜歡看。妳寫的失眠很痛苦，妳替我講出來了。我失眠很多年了，我可以不吃葯，但是我的作息時間就變成日夜顛倒。以前，我在這裡教書時，真的被寵壞了。系主任雖然是外國人，真是儒門弟子，對我非常的寬容。曉得我早上爬不起來，早上就不給我排課，交待祕書說：早上電話不要接給白教授，對我真是體貼入微，真好的一個老先生！所

以，我所有的課都排在下午。車子開到學校，停好車，關了車門，進教室，總共十三分鐘，算得準準的，輕鬆得很。不像洛杉磯，開車動輒三、四十分鐘。也不像台北，衝突性高，我的朋友回台灣去，一個月後，馬上加入戰局，aggressive 得很。

廖：《白崇禧傳》現在寫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白：一直拖下去，我不是學歷史的，所以，寫一點，碰到一堆史料，就不得了了。

廖：在這兒寫，資料夠嗎？

白：我也到大陸、台灣去找，這邊的資料也還有一些。美國的幾個圖書館的資料，像胡佛 institute 的資料很足的。現在麻煩的是，民國史的確是一個很麻煩的事，很多的史料有待求証，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廖：你會不會因為某一個關鍵沒有解決就耽誤了進度？

白：會，是這樣的，就要去解決，還要去訪問人家。像寫到 1946 年四平街的那一仗的時候，還很巧的，訪問到余紀忠先生。前兩年，我還特別去看他。以前他跟我講過一些，關鍵上的，他是當事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會議，我父親跟杜聿明在東北開軍事會議的時候，決定要打長春，余紀忠先生也正好在火車上。余先生就告訴我當時的情況，有什麼人在火車上，很重要的一份電報是他發的，那種臨場感，講得非常生動！

廖：你寫這些東西跟以前寫《台北人》有很大的不同嗎？

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歷史的感嘆上，也有些相同的地方。我想《台北人》也就是這段歷史的結果。我之所以可以寫《台北人》，就是因為這段歷史的一個結果。

廖：創作是一件很迷人的事喔？

白：創作完全是一個人的世界，可以說是個很孤獨的一條路，沒有人能夠幫你。

廖：您年輕的時候就一直想走寫作的路？還是陰錯陽差走到這一條路上來？

白：談到這點，真是很有意思的。中學時，我就對寫作感興趣。國文老師對我鼓勵很大。那時，作文總是得到好的評語。當然環境也很要緊，開始我是念成大水利系的，當時，一邊建三峽水壩，一邊寫作，是我的一種夢想。地理書

上說，建了三峽水壩，國家就會強盛起來，於是，我就決定建水壩去。那時，真不知天高地厚！關鍵是念了一年水利後，發現興趣不合，只好重考，那是非常關鍵的。其實，在成大唸水利，我還是可以念，直接念下去就算了！成績也還不錯，還是班上第一名。

廖：本來還可以建水庫的！

白：是呀！但是我曉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工程師，我曉得我只是會考試而已。

廖：那時，顯然您對自己的志向，是有非常清楚的概念的？

白：當時，就考台大外文系！我原想唸國文系，就去跟我的國文老師李雅韻老師商量。她說：「你不要念國文系，念外文系，國文系比較上是作學問的。」

廖：那時候的國文系好像比較重視經學。何況，當時作家多半出身外文系。

白：她說唸外文系對於創作比較有幫助，李老師對我影響真的很大。她明智的地方，就是她自己是唸國文系的，卻沒有特別叫我走同樣的路。這個轉折滿要緊的。外文系整個氣氛，整個念的東西，還有老師、同學都很好。也是因緣際會的，有一群搞現代文學的好朋友。

廖：後來，幾乎每個都在那一行裡出類拔萃。

白：像劉大任，也是我們那一屆的，他是念哲學系的；陳映真雖不同校，可是也是同屆的；王禎和晚一、兩屆。我現在回頭看，六十年代是對台灣的文學改變一個很重要的年代，因為戰後的這一批作家突然出來了，成熟了，嶄露頭角了。因為受了完整的教育，這也很要緊。如果整天逃難，也不行，我們真的好好念了書，有了安定的環境。大家都罵這、罵那，我必須要講感恩的話。我們還可以寫作、辦雜誌，可以在夾縫中長出一些樹啊、草啊、花的，同個時代，大陸就不可能了，正好是文革最糟糕的時候。而在建中，我奠定了基礎，老師又好，成天要我們背書，連史記都背，還要默寫。

廖：現在的教育比較不是那麼嚴格。

白：我覺得應該要回頭呢！我得要發點勞騷，我看到報紙上寫，還說不考作文呢！教改、教改，我覺得好像愈改愈壞。

廖：一般覺得作文評分不容易達到公平，所以主張廢考作文。我覺得這有點因噎

廢食。

白：對對對！應該想辦法達到公平啊！

廖：其實要講完全的公平，也是不可能的。世事哪有絕對的公平呢？

白：根本不可能嘛！就講數學吧！可能這個學生比那個學生程度要好些！但是，剛好題目出到他不會的，怎麼公平呢？完全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是廢考作文是不對的。應該要加重才對啊，怎麼能廢呢？不要說別的，不要說創作了，到時候，就連一篇基本的文書都寫不通。

廖：將來考題都變成選擇題了，專意於釘釘字句的解釋，可能連話都說不好。

白：選擇題都是有幾分取巧，猜題的，運氣好的，猜對了，不是更不公平？教了二十九年書，我連美國學生都讓他背詩，默詩呢！現在我回想古文那一套，我覺得要打根基，背多少篇、多少首，那個節奏、那個韻律感覺出來，非常有用。少背一點可以，但是很重要的那些，一定是要的。像前、後赤壁賦，我們都背的！琵琶行、長恨歌都從頭背到尾，經典的東西一定要背的。教得好的話，學生會有興趣的。

廖：沒錯！其實師資才是大問題。教甚麼固然重要，怎麼教才不致斷喪學生的學習意願更根本！

白：以前我在台大旁聽葉嘉瑩教授的課，她會講得不得了啊！你聽了一次，都覺得不夠，她講多少次，你都會去聽。所以是師資問題、教法問題。這樣因噎廢食，遷就學生，是不行的。我看現在台灣的教育問題很大。從前聯考的時候，他的教法是比較僵化，但是別忘了，我們這群也都是聯考出來的，也沒有傷到那裡去。現在那些很優秀的領導人物，還不是都是從聯考出來的。你看他們多會講話啊！聯考並沒有把他們的頭腦鎖死。聯考是可以改，但不是這樣改。而且太輕率了。

廖：看起來您對台灣的教育問題很憂心？

白：我是滿擔心的，從前的聯考是背水一戰，非唸不可，不唸就沒路可走。現在是比較寬一些，可是，台灣學生到外面來的競爭力是越來越弱了，現在大陸學生反而起來了。我的教育信念是不能平頭式的，一定是要有精英，

下面普及，一定要培養出一批精英來。人的才智不可能是齊頭式的，上天的確是不公平，有人才智高、有人才智低。才智高的人當然要給他最好的教育啦！中間有一批社會大眾，各行各業，否則怎麼會有人領導！台灣現在有這個條件，有這個經濟能力。這麼多年來，培養了這麼多師資，雖然有些不是盡如人意，但是比起來，不算壞的，碩士博士也是一大堆。台灣有條件把教育弄好。所謂聯考、甄試或考不考作文全是技術問題。吵來吵去，從沒去思考要教育出什麼樣的學生來。二十世紀末了，還沒有人去質疑華人世界的教育對不對，我看是錯了。所以算起來二十世紀的中華文化是低潮。我們有教育部長，沒有教育家。教育部長都聽命於政府、政策，不只台灣，大陸、香港，所有華人世界都一樣，都還沒有通盤考量。

廖：那您是覺得西方教育要比較好一些嗎？不是也同樣有人質疑西方教育太過放任嗎？

白：很重要的一點，美國的教育至少還有一個西方文明史是所有人都要修的。從古希臘、羅馬、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大學生至少有基本的了解。除西方文明外，他們還要選一門非西方文明的課，可以是藝術，也可以是文學。我們的大學生應該都要學一門中國文化史，是必修的。尤其是現在，秦俑也出來了，三星堆也出來了，我們整個文化史要重寫了。應該集眾人之力寫一本文化史、教育史，讓學生去念。然後配上圖片，讓我們的學生至少對文化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我們以為美國人好像不注重文化。即使這樣，人家的教育還是比我們的好得多。今天你學 Computer 也好，學音樂也好，對中華文化有基本認識，任何一行，你總有一個舵穩在那個地方，你可以走任何方向，這才是教育。不是只是教你考試或出來找一份工作。文化的教育很重要，問題在於一沒有教材、二沒有師資。

廖：教材的品質的確和師資一樣，都很讓人擔心。您覺得我們的教育內容有什麼問題嗎？

白：我那個年代，中小學美術課，就拿個花瓶、橘子、香蕉、拿個外國石膏像去描。五四以來，為了全盤西化，為了救亡圖存，強化科學、醫學、

堅甲利砲，這都能夠理解，但有什麼理由只畫蘋果、香蕉，這是不是有一個前提，就是承認我們自己的花鳥是不好的，不值得的、是應該廢掉的，誰敢這麼說！我現在要問，要質疑有什麼理由，要全國的學生都去畫維那斯的頭？我每次去歐州都感受很深。到羅浮宮、佛羅倫斯去出來以後，都感覺頭很暈，都是人家的傳統。我們要去研究別人的東西之前，是不是應該先把自己的東西弄懂？自己還不懂自己的，怎麼去了解別人的！

廖：確實！現在台灣許多的展覽、比賽或演出，不管音樂、美術或戲劇，往往較重視西方的。

白：我們的美術系，國畫往往是點綴、點綴而已，好像學國畫是落伍得不得了的事，其實有些東西是沒得比的。譬如，西方注重人物畫，我們主要是山水畫。拿從唐、宋、元、明下來山水畫傳統，跟西方的人物比，等於是拿香蕉和蘋果比，兩個不同的東西怎能比好壞？我們的傳統是從書法開始、毛筆開始、線條開始；他們是從顏色、塊狀、光開始，是不同的兩個傳統。我們廢棄了毛筆、山水畫，去畫維那斯，是畫不好的，永遠只能追在人家後面。這就像要全美國的中小學生都拿起毛筆畫山水畫一樣，也是很可笑、很恐怖的事，而我們竟然就做這樣的事！

竟然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我們要去畫蘋果、香蕉！我要問誰有這個權利，膽敢說要廢掉我們的毛筆、山水、花鳥！而且以訛傳訛，一直傳下來。現在我們的美術系基本上是個西畫系，音樂更是。學小提琴、鋼琴的很多。好像考不上西樂組的才去考國樂組。我現在拚命推廣崑曲，崑曲裡音樂的曲牌那麼複雜，這麼美，我發覺了以後，大吃一驚！不錯，我們現在出了幾個演奏家，像馬友友，很了不得，世界級的，但是也是對西方音樂的貢獻，那麼我們的竹笙管笛，國樂的整個東西是不是就應該廢掉呢？基本上是已經廢掉了，不曉得什麼人開始，讓我們學校的小朋友，只學鋼琴、小提琴，不吹笛子、不拉二胡。

廖：二胡是沒有，但是，現在的小學生應該也有教吹笛子的，我的孩子好像在小學學過。



白：總之，沒有一套完整的中國音樂教育，當然，音樂絕對是西方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應該欣賞，我也愛聽。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的教育要把整個中國的音樂廢掉，這個傷害的後遺症，至今還沒有人檢討。戲劇系只教西方理論，不去研究崑曲。演劇也演翻譯出來的劇本。我在北京人藝看他們演話劇，戴個假髮，一口翻譯的名字，什麼「瑪莉亞」！我覺得太滑稽了。莎戲的英文美得不得了，翻譯出來卻怪得不得了！我看過《李爾王》，跟原文的比，覺得怪怪的。如果在外國，像崑曲這麼豐富的寶藏，早就不曉得多少人去研究了！我們沒有！還讓它幾乎亡掉，現在還讓聯合國來救，聯合國把它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自己莫名其妙的讓它消失，這麼美，這麼感動人，為什麼不放進學校的課程裡去？

廖：因為沒有接觸，就不會喜歡。我有時請國光劇團的演員到我的班上來示範表演，學生馬上就愛上了。

白：所以，這陣子我好高興，做義工，大力鼓吹崑曲。演出的時候，也有很多年輕的人去看，記得 1992 年，我第一次請華文漪到國家劇院演出三個小時的《牡丹亭》，演四場。剛開始，我很擔心，這麼大規模演出，萬一只來小貓兩、三隻，我鼓吹這麼久，我不是信譽掃地嗎？哪曉得，後來四場的票賣得精光後來演出的《釵頭鳳》，賣座也很好啊！

白：是啊，後來崑曲就起來了。我覺得應該要制度化，如果不放到學校裡去，有一天還是會不見的，因為沒有教育它。今天中國人之所以不像中國人，就是因為失去了自己的美學教育嘛！只有在學校正規教育裡教，人家才會尊敬這個東西。當然大陸更不成話了，文革統統把它毀滅掉了。他們的問題也大，不過現在他慢慢的覺醒了，只是現在改不了口，以前破四舊破得那麼厲害，不能說一下子又崇拜回去。台灣莫名奇妙，什麼去中國化。我能理解政治上的對峙，但是，文化上都是一個源頭下來，文化又不是共產黨的文化，是共產黨以前的幾千年的東西。在台灣強調去中國化的現在，我似乎在講反潮流的話，但是，不恢復這些中國美學，是很大的損失，損失了我們的美感。全盤西化的結果搞得我們美醜不分。我去了 Florence 深有所感。看了

他們的大衛雕像後，下來看到他們最漂亮的設計都在那裡。原來如此！從博物館就直接移到這兒來，原來他們對那一種設計、那種 form 那麼有信心、有創意，色彩那麼準確，義大利的家具也好，服裝也好，是傳統在那裡嘛！中國人現在設計不出自己的東西來，只好穿 Armani。雖然不一定要回頭穿長袍，但是中國人要建立起自己的東西來。尤其看到大陸上一百個新娘集體穿白紗，真覺得好可憐喔，有人幫新娘抓著長裙，顛顛倒倒的，都走不動了，因為腿短嘛！你說可不可笑？如果一百個全都是大紅百褶裙，喜氣洋洋的，多美！我們的美感全失去了，失去它是因為人爲的、教育的。這些管教育的都是外國留學的。拿回去的那些東西不曉得通不通，真是叫人憂心。

廖：教育部長恐怕很多都不是學教育的。

白：都不是學教育的，大部份是學理工，我一點都不擔心我們的工程，我們的商業文化也很快！這是全球性、世界性的東西，容易，大家都在講全球化……你幾句話就把我的牢騷都引出來了，整個華文世界的教育都是問題，二十世紀過了，什麼都廢了，毛筆廢了、作文廢了、什麼都廢光了。好了，就去學西方的東西，難啊！每去歐洲一次，就深有所感。先廢光了自己的東西，再去學別人的東西，這是很危險的。應該是自己先有了根基，再去學別人的、融會別人的，然後創發。

中國也是有許多外來的文化，不過別忘了像唐朝有很穩固的自己在裡頭。現在我們很虛弱，中間什麼東西都沒有，大陸學生來美國比台灣學生更容易西化，他們學美國學得更快，台灣還算有一點自己。因為文革更厲害，台灣至少還念了一點四書，至少傳統的東西還有一些，所以，基本上大陸的文化根基更弱。所以妳在台灣當老師會不會有點著急？

廖：是有一些。

白：我們的創作力死去了，原因很多，我們常歸諸於戰亂，但是歐洲戰亂也不少，法國亡國那麼多次，所以不能拿這個當藉口。我們爲了救亡圖存，所以要把文化拋掉，但中國還沒亡啊！法國亡了幾次，各種的思想藝術、甚至科技，各方面都跑在前面，歐洲兩次大戰也不得了，也破壞得很厲害，可是

又起來了，因為有文化的根在那裡。

廖：所以扎根的動作要做？

白：要！我到上海去，他們新的博物館就弄得很好，以前的很破舊的。還有一點我滿感動的就是，那些年輕的學生一進到裡頭就規矩了，對文化肅然起敬。現在江南這一帶，上海、蘇州富起來了，舊有的文化傳統漸漸恢復起來，當然需要滿長的一段時間。現在蘇州經常演出崑曲，有固定的崑曲演出場所。他們已經有所覺醒，蘇州本來就是崑曲的重鎮，也就曉得驕傲了。他們的演員喜歡到台灣來演，台灣有知音。

廖：剛開始上崑、蘇崑到台灣時還造成風潮，滿轟動的，現在好像也失去了新鮮感，票房好像也不好了。

白：所以說還是要扎根，還是要有長期的教育才行。不過，最近台灣因為經濟不好，買很貴的票去看戲，比較捨不得。票房不好跟這個可能有關係。

廖：沒錯。以前買六百元的，退下來買三百元，原來買三百元的，恐怕就不再進劇院了。

白：買書恐怕也是這樣吧！隱地也跟我談了很多這方面的問題。現在，長篇的東西年輕人受不了，《紅樓》、《三國》、《水滸》大概都只看漫畫了。不知看完漫畫後會不會再找原著來看？

廖：學生們都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很少有人看完文本。

白：現在的學生整天講電話，整天就搞 e-mail。所以，我就講，要有一些菁英教育，要嚴格一點，培養一些很嚴的好學生。從前我們是滿嚴的，也有好處。你們那個年代，作家多半出自外文系，現在好像少了點，反而中文系的作者多了些？

白：我覺得這倒是正常的。中文系應該多一些，第一、中文系的底子好些，第二、他也接觸了中國文學。現在的外文系功課反而重了，應付學校的功課已經很吃力了，沒有時間再去寫。我們那時候功課真的不重，我們還有餘力可以辦雜誌。

廖：這跟老師的鼓勵是不是也很有關係？以前我們中文系的老師就希望

我們惜墨如金，多讀書，少發表。

白：是啊！我們那時候有夏濟安老師鼓勵，現在中文系改了，現代化了，台灣文學、現代文學變成顯學了，選課的人也多了，這是好現象。

廖：現在文建會都在鼓勵，研究所裡，你只要研究台灣文學，就可以申請補助；是啊！像台灣的梅家玲、江寶釵過來開會，都說大學裡開現代文學的課，選修的學生很多。

廖：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又可以不必太悲觀了。謝謝您接受採訪！